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对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思想史意义的考察

吴 浩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北京 100089)

[摘要]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的古今中西及其未来,可以从丝绸之路历史观、地理观、经济观、文化观等四个维度进行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所取得的成果,与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密不可分。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从历史地理概念化用至政策规划蓝图,更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衍变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方案。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而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研究,正成为以全球网络为场域、赋有全新意义的丝绸之路研究。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观”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18

一、引言

丝绸之路被视为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等民族友好交往的见证和象征。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各大古代文明相互影响、互学互鉴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更加远古的时期,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被视为丝绸之路官方通道正式开辟的标志。

尽管这条道路上中外文明交通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却在19世纪晚期。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的概念。李希霍芬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

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包括了时间、空间和载体三个维度。时间跨度上,以东西汉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相通的历史为界,起讫点从公元前114年(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到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即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空西域之后(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次年逝世)到东汉第三次打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2]从地理空间考量,这是一条沟通中国与中亚各国以及阿富汗、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就物质载体而言,承载的焦点定位在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活动。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的丝绸制品很快经

作者简介:吴浩,副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由叙利亚等地传播到罗马帝国腹地。基于这样的历史,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其著作《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将李希霍芬版本“丝绸之路”的空间概念西移到叙利亚,提出:“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3]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欧洲旅行家、学者在中亚腹地古丝绸之路上的探险发现,印证并丰富了李希霍芬、赫尔曼等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内容。

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始自法国汉学家沙畹。1903年,沙畹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中提到:“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 Sogdiane 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庐羯泚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洋之舟航也。”^[4]中国学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研究最早出自饶宗颐,其著作《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发表于1974年。1974年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南宋沉船、1986年瑞典“哥德堡号”沉船、1987年广东阳江南宋沉船“南海一号”、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等发现,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1987年至1997年之间,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规划”。中国学者刘迎胜曾参加该项目的多次科考活动。据刘迎胜的回忆,当时关于项目规划的命名也有“香料之路”或“瓷器之路”的建议。但更大多数人坚持:“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而且又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接受的,唯有‘丝绸之路’的概念”。^[5]也正因此,“丝绸之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项目的正式名称。

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东起西安,西至中亚的七河地区。全项目包括33处遗产点,中国境内存有22处,分布在陕西、河南、甘肃和新疆等省区。近年来,中国泉州、广州、宁波、南京等二十多个城市组建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积极筹备将海上丝绸之路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鉴于对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希霍芬、赫尔曼、沙畹等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定义已无法涵盖其所承载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全部内涵,中外学者对丝绸之路提出了新的定义。中国学者林梅村认为丝绸之路是“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6]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认为:“‘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7]

二、“丝绸之路观”视域下的中国丝绸之路研究

晚清道光咸丰以降,中国西北边疆危机严重,西北史地学兴起,为此后的丝绸之路研究埋下了草蛇灰线,但西北史地之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主题的研究,散布于中西交通史、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之中。中国学界完全接受“丝绸之路”的概念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并形成了“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丝绸之路研究成为时代显学。纵览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概念提出以降的中国丝绸之路研究,并非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单一学科可以概括,而是需要以一种全新的“丝绸之路观”来审视的学术研究母题。

丝绸之路观,简而言之,即如何认识丝绸之

路的古今中西及其未来,可以分成丝绸之路历史观、地理观、经济观、文化观等四个维度。

(一) 丝绸之路历史观

丝绸之路历史观,即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的中外民族友好交往、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其重点在于史料的发现和运用——应该如何辨别新材料之真伪?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史料相互串联起来,互相论证并启发新知?

王国维针对此种问题提出了“二重证据法”。1925年,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是运用考古发现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的“纸上之材料”相互释证,“二重证据法”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不二法门。中国丝绸之路研究在史料的发现、掌握和运用上,秉承了这一法则。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的邀请,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王国维在演讲中秉持“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的“二重证据法”,阐述了中国历代学术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8] 后世坊间有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的提法,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位列其中。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王国维的这篇演讲。敦煌遗书于1900年被王道士于敦煌莫高窟发现,其中珍品被斯坦因、伯希和等攫取,至今仍藏于海外。居延汉简为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等联合组建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烽燧遗址科考发现的汉代简牍。

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当中,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可归为丝绸之路研究的史料发现。丝绸之路研究在“四大发现”中占据半壁江山,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分量可见一斑。

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新潮流也秉承了丝绸之路历史观的优良传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初动力,乃是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大月氏承平日久早已忘却国仇家恨,张骞未能说服大月氏组成攻打匈奴的联合战线,但却意外取得“凿空西域”的历史功绩。但在之后的历史典籍当中,大月氏的文献付之阙如。发现大月氏,成为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贵霜帝国是由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所建立。但据2016年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的联合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汗河流域保留了大量的游牧文化遗存。按照“二重证据法”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文化遗存。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1世纪苏尔汗河流域的农耕文化遗存属于早期贵霜文化,属于农耕文明性质,此后的贵霜帝国亦是如此。中乌联合考古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很大程度上与大月氏相关,“属农耕文明的贵霜帝国是由属游牧文明的大月氏所建立”的传统观点在考古学上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二) 丝绸之路地理观

丝绸之路地理观,即如何认识陆上和海上文明交通所构筑的丝绸之路全球空间网络,亦可称为丝绸之路空间观。李希霍芬、赫尔曼提出和发展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沙畹继而提出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的概念。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得出丝绸之路四条主要路线的空间认知。

其一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从中国汉唐时代的首都长安、洛阳经河西走廊、西亚、巴尔干半岛到达罗马,或经东欧、中欧到达罗马,这条丝路是古代陆上丝路的主道,张骞凿空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条。其二为草原丝绸之路,也叫北方丝路,从中原地区北上出关,进入北方草原,一路

向西,过东欧平原,直抵欧洲。朝鲜和日本发现的公元4世纪以来的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有一部分可能是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其三为西南丝绸之路,从关中及中原地区过川藏,到达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欧洲、北非,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阿富汗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很大可能就是出自这条丝路。其四为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是中国唐宋以后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东海航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南海航线,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广西合浦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9]

唐朝僧人玄奘赴印度求法,后将此间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的详细记载,成为还原印度中古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蓝毗尼、那烂陀等遗址的考古挖掘,就是依据《大唐西域记》的文献。19世纪中晚期,该著作的影响还从历史地理领域辐射到军事政治领域。它对帕米尔高原有较为详实的路线记录,也因此成为彼时英俄两国在中亚博弈和探险考察的重要参考。复原玄奘取经路线,成为欧洲东方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全球地理定位(GP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深入解读中外文献,将文献和技术视作新的“二重证据”“互相释证”,对玄奘帕米尔段路线精准复原成为可能。2014年5月,中国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团队研制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上线,精准复原了丝绸之路帕米尔段的主要路线,以及重要地标的影像与GPS数据。^[10]建立《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精准复原,首先要在考察之前,利用文献确定路线,厘清文献中的问题;其次在实地考察中确认路线,利用GPS等手段记录相关地点的地理信息,最终通过GIS呈现出一个精准复原路线的网站以供浏览和数据下载。^[11]

(三) 丝绸之路经济观

丝绸之路经济观,即科学认识构建和推动丝

绸之路良好运行的经济基础和物质载体。以一国为中心的天下史观、单一国家中心史观或欧洲中心史观都不能承担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研究的重任。以交往为核心概念的全球史观有助于树立科学的丝绸之路经济观。

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helm H. 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其表现。”^[12]麦克尼尔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中继续阐述其核心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所有网络都包涵合作与竞争两方面的内容;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人类群体都在各自所处的层面之上,进行非常有效的交往与合作,从而确保自己的竞争地位和生存机遇得以改善;各种网络将合作与竞争都包容在自身的体系之中,并且规模也随之扩展;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地球的历史。^[13]

经济互惠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夯实丝绸之路的基础,对异域商品的市场需求是开辟丝绸之路最为直接的动力。风靡丝绸之路的中国商品,远远不止丝绸一种。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是生物物种、经济产品、科技发明广泛传播之路。对“哥德堡号”“南海一号”“黑石号”等沉船的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茶叶、瓷器。丝绸贸易、茶叶贸易、瓷器贸易等见证了陆地和海洋丝绸之路开辟、发展、壮大的历史。经济全球化成为推动丝绸之路四通八达、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经贸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四) 丝绸之路文化观

丝绸之路文化观,即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当下。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感慨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在往昔,

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14]

敦煌吐鲁番学和泉州学是中国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按照季羨林的观点,第一个使用“敦煌学”名词的学者是陈寅恪。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15]季羨林沿用陈寅恪的概念,认为:“凡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壁画、雕塑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16]

与敦煌相仿,吐鲁番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20世纪初以降曾发现大量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文献,关于吐鲁番丝绸之路主题的学术亦被称为吐鲁番学。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羨林担任首任会长。季羨林从世界文明交汇的角度认识其意义,“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7]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林梅村、荣新江、郝春文等学者在敦煌吐鲁番学上的研究在海内外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世纪的几位著名旅行家,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等都曾到访过中国泉州,并将刺桐港(泉州旧称 Zayton)描述为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泉州因其具有的多元文明融汇的特点,被各国学者所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为主题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将泉州作为重要考察城市。1991年2月,恰值马可·波罗从泉州(刺桐港)返国七百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干事杜杜·迪安博士率队来到泉州进行实地调查。杜杜·迪安博士盛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象征性的起点”,是“欧亚大陆海上贸易路线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泉州籍文化人类学学者李亦园从中外交通的视角剖析泉州:“从纵的历史时间看,它曾是汉族接触南方少数民族的桥头堡,成为一个文化融合涵化的烘炉,它更曾是中国对外接触交流的最大港口,扮演了吸收外来文化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角色,因此形成了较独特的文化特性。从横的地理空间而论,泉州的文化特色却因其拓展海外的传统而得以延伸至更宽广的境域而包括东南亚等地。”^[18]李亦园倡导新视野下的“泉州学”,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泉州地区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19]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这代学者在“泉州学”上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研究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其主要内容即“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多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五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亦得到广泛认可。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5月,中国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国政府、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诸多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和务实成果。高峰论坛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都试图提供机会、全球公共产品和双赢合作,都致力于深化国家和区域间的联系;为了让沿线国家能够充分从增加联系产生的潜力中获益,加强“一

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至关重要。^[20]2019年3月,分处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与意大利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这一协议的“七国集团”(G7)国家。2019年4月,中国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旨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所取得的成果,与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密不可分,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到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再到当代丝绸之路研究的自然延续。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从历史地理概念化用至政策规划蓝图,更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衍变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方案。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丝绸之路研究多重意义的成功。

“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反过来又促进丝绸之路研究的再度繁荣,并推动产生新的学术研究热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经贸与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加深,需要对世界各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界成为显学,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必须植根于外国语言文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政治学等各个基础学科的发展。对中国学界而言,区域国别研究不啻于以全球网络为场域、赋有全新意义的丝绸之路研究。

回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丝绸之路研究,希望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而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探寻新材料,丰富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引领新思潮,成为以全球网络为场域、赋有全新意义的丝绸之路研究。这也是考察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思想史意义所在。

注释:

[1]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1, Berlin, 1877, p. 454. 转引

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后汉书·列传·西域传》:“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已西遂绝。”

[3] Albert Herrmann, *Die Ä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ag zur Älten Geographie Asiens*, Bd. I, 1910, p. 10. 转引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

[5]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0页。

[6]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7] [美]米华健:《丝绸之路》,马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8]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9] 参见徐茅芳:《丝绸之路考古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10] 参见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http://silkroad.fudan.edu.cn>。

[11] 参见侯杨方:《玄奘帕米尔东归路线的复原——基于GPS和实地考察的研究》,《历史地理》2018年第1期。

[12] [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译者序第25页。

[13] [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14] [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6页。

[16] [17] 季羡林著,《季羡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季羡林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11、217页。

[18] [19] 泉州泉台民间交流协会、泉州学研究所编:《李亦园与泉州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2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古特雷斯称赞中国为多边主义的一大中心支柱,联合国官网,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2017/05/at-chinas-belt-and-road-forum-un-chief-guterres-stresses-shared-development-goals/>。